

走出西方

真实的世界与中国的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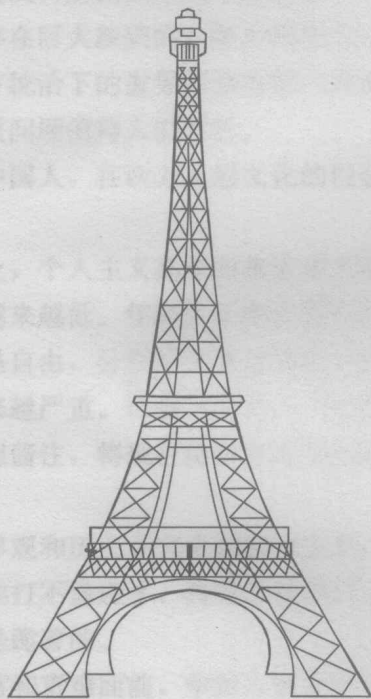
余生著



走出西方

真实的世界与中国的抉择

余生 著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走出西方

作 者:余 生

特约编辑:郑智鹏

责任编辑:陈前进

出版发行: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北路 25 号

邮 编:102600

E - mail:bjpress@yeah.net

印 刷:北京华北新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6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900722-20-1

总 定 价:298.00 元(1 书 +1 光盘 共 10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这是西方统治下的世界。要懂得当今世界，得先了解西方。

初看西方，你会觉得一切都那么的合理完美：它的社会多么自由开放，它的人权保障那么完善，它的民主理论和多数原则简直无懈可击。就算有些许不足，你也会相信西方民主理论家们常说的那句话——一切都是人民决定的，人民会自行改正错误，所以根本用不着担心。

可是西方明明是存在巨大缺陷的，要不然西方不会有那么多的侵略战争和政治经济危机，西方统治下的世界不会有那么多的暴力、恐惧、歧视、堕落和谎言。西方的本质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现代中国和许多中国人，在西方思想文化的侵袭之下，已经很难找到自我了。

在当今中国社会上，个人主义高涨而集体观念越来越低下。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际信任度越来越低。年轻人对西方的生活模式趋之若鹜，以为西化就是时尚，放纵便是自由，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越来越差。人性堕落现象和文化快餐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知识精英——已被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想酱住，将现行的西方民主模式捧为中国民主改革的终极目标。

如果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完全被西方左右，只会人云亦云，如果连心灵都被西方占据，挨打不懂还手、挨骂无法还口，那么中国人即使看起来昂首挺胸着，其实还是跪着的。

在西方无尽地奚落和责难面前，中国人该奋起了。

所以我们要提“走出西方”！

走出西方，是指走出对西方的痴迷，找回自我，做有主见的中国人。

走出西方，是指走出妄自菲薄的认识错误，发现中国的长处，建立中国文明、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自信心。



走出西方，不是孤芳自赏、妄自尊大，而是扩大交流和拿来主义。

走出西方，是走出西方思想体系的“话语权”束缚，建立超越西方的、以逻辑为基础的更合理的思想体系。

世上凡事有利必有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本书主要探讨中西方的本质差别和利弊得失，目的是期望中国能兴利除弊，走利益最大化的道路，铸造真正的中国模式。

中国社会正处在“青春燥动时代”。这是社会行将巨变、即将成熟的典型征兆。而只有“走出西方”，中国才有前途，世界才有希望。

2008年，不仅会因为惨烈的自然灾害和百年奥运盛典而载入中国史册，还将会因为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民终于看清了西方人的本性的年份而长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在东西方交流碰撞中，中国人民越来越自信。而最值得中国人自豪和骄傲的，是他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度，拥有一个真正的文明。

当然，本书并不准备提供什么真理，它仅提供本人的一点思考，权作抛砖引玉之用而已。限于学识水平，书中肯定存在颇多错漏不当和重复之处，欢迎读者们批评指正。

余生

2009年5月

目录

Contents

中国的文明

中国文明的源起	2
春秋战国时代	5
趋统内敛时代	17
新时代，趋统内敛史的延续	34

西方的文明

西方文明的源起	44
统一时代	49
战国时代	55
战国现象	75
新世纪——全球战国时代?	88
中国的自处	109

利益至上与民主冲突

西方民主的源起和特点	138
利益至上	147
原则的丧失	168
西方民主的冲突	206
西方的民主责任	213



民主与权威

社会价值观	222
国家利益	243
人民权威	246
民主的新制衡与社会的和谐	255
独立的理性势力	269

民主中国

中国的民主	272
变革之初探	285

附录

1	附录一
2	附录二
3	附录三
4	附录四
5	附录五
6	附录六
7	附录七
8	附录八
9	附录九
10	附录十

参考文献

1	参考文献一
2	参考文献二
3	参考文献三
4	参考文献四
5	参考文献五
6	参考文献六
7	参考文献七
8	参考文献八
9	参考文献九
10	参考文献十

中国的文明



臥驚內則文國中



中国文明的源起

公元前 27 世纪的中华大地，正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在黄河中游与汾水下游一带的黄土地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部落，展示着他们的灵感和顽强的生命力。各部落之间争斗频繁，其中有三个部落最为强大：正趋衰弱中的神农部落（酋长称炎帝），兴旺壮大中的有熊部落（酋长轩辕）和九黎部落（酋长蚩尤）。炎帝是部落联盟盟主，但他的威望和实力仍不足以使各部落停息纷争。轩辕经过长期的布德修武，深受民众爱戴，周围部落也逐渐归服于他。在一次战争中，有熊部落打败神农部落，之后又打败九黎部落，杀死残暴的酋长蚩尤。于是，各部落拥轩辕取代炎帝成为新的部落盟主，称黄帝。中国文明初起于部落兼并而成的部落联合王国。

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人们以农耕生产为主。适宜的气候、水利和稳定的社会生产环境是发展农业的前提。农耕的长周期性和共同的生产要件——比如开发水利灌溉系统和共同应对自然灾害——都要求人们组织起来，形成共同维护公共利益，相互顾及的聚居生活模式，追求一种长期确定和有保障的，即存在权威核心（将权威核心视作集体利益的维护者）的社会环境。人们将维护集体利益视作最大的社会正义，在此基础上再维护个人权利的公平公正，即奉行“集体主义”。只要社会上出现有利于社会整体稳定和生产发展的权威，人们必然景从于它，以它为核心建立起大型聚居社会。

黄帝威德并用，以规则和权威管理取代部落间原始血腥的争夺，建立社会秩序，实现和平。他下令从此禁止各部落之间私相武斗，部落争执须向他投诉，由他调解。对于不服管理的部落，黄帝就用强力手段征服。传说也是黄帝建立了最初的经济秩序，发明了最初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建立起有组织秩序的文明国家雏形，被中华民族尊为“人文初祖”。



经过黄帝王朝的历代君主的治理，归服部落越来越多，王国的地域在不断扩大。五帝之一的尧帝在逝世之前，将君主权位以“禅让”——非世袭传位给下一代有德有能者——的方式让位给舜，舜也以同样的方式让位给禹。这是君主权位非世袭传承的最早尝试。

公元前 23 世纪，禹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夏王朝。他将全国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以首都安邑为中心，五百里以内由君主直接管辖，作为王国的“中央力量威慑区”，称“甸服”，人民向君主直接纳税；在“甸服”之外围，每五百里划一个区，分别称“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像同心圆一样拱卫着中央区。君主的影响力随着距离渐远而减弱。这五个区域之外，就是夏文明难及的“化外之地”了。传说禹曾将当时已知的天下划分为九个区域，称“九州”，于是后世有时就用“九州”代表中国。

禹死后，禹的儿子启夺得君主位置，经过一番巩固权位的战争，启废除了“禅让”制，恢复了君主世袭。

据记载，由于辖下的部落拥有相对独立的军政力量，夏王朝的初期政局不太稳定，发生过几次差点导致亡国的严重政变冲突。夏王朝的统治延续了四百多年，最后一任君主桀非常残暴，而这时，商部落的力量逐渐强大，首领成汤很得民心。成汤联合其它部落一起推翻了夏桀的统治，建立起商王朝。商部落接受了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逐渐向稳定的农业社会转变。

商王朝建立起一个中央官僚机构，商王能直接管理各地的部落首领，中央集权有所进步。但各地的世袭部落首领在本部落区仍然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部落的强大导致商王朝建立初期出现一些动荡。商王朝在基本稳定中延续了六百多年。

君主专制使中国历史常出现循环特性。商王朝中后期有几位君主昏庸无能，最后也出现了一位特别残暴的君主纣。这时，商王朝辖下位于渭河流域有个从事农业的周部落，大量吸收被商纣王迫害的有才能者和百姓，逐渐强大起来。周联合各部落推翻商王朝，建立起周王朝。

周以首都镐京为中心，沿渭水下游与黄河中游划出一大片土地，由周王直接统辖，称作“王畿”。周王也依靠“王畿”强大的军政实力保证统治权威，与夏商两朝相似。周王建立起“分封制”，将王畿之外的全国土地分封给各亲属、有功的大臣将领和“先圣先王”的后代，形成以周王为权力核心、各“诸侯”国并列的权力体系。诸侯每年要向周王朝觐和进贡，他们在首都镐京有专门的官署。各诸侯对封地内的平民与奴隶享有支配权，并保有

军事力量。诸侯之间相互尊以国君之礼，不能相互干涉内政，只有周王有权剥夺诸侯国国君的世袭封国与爵位。当周王征兵作战时，各诸侯必须率领各自军队，听候调遣。

为了加强统治，周王朝在周王、诸侯、贵族、平民与奴隶各阶层之间规定一种详细复杂的礼教制度、世袭宗法制度——即“周礼”，将“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与贵族继承模式固定下来。周王不仅是世俗的君王，而且是“得之于天”的精神领袖，其统治权威具有神圣性，以维护统治者的特权和社会的稳定。

这就是中国文明的源起阶段。受农耕生产方式的影响，中国文明总是追求一种确定性，从一开始便认识到社会核心的确定对维护社会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因为核心权威通常代表着长期确定的规则和社会秩序（尽管这种权威通常建立在强权、神权的基础上），有利于农耕生产的发展，所以人们不会贸然打破它，除非核心权威失去权威性，自我崩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虽然旧王朝屡被推翻，但世袭制却数千年不变的根本原因。农耕的自给自足性和对环境稳定的渴望，使中国文明不太可能产生对外掠夺的野心，缺乏攻击性。人们通常称这一特性为“内敛”。

夏商周三代都是部落诸侯联盟，君主作为“共主”存在。拥有军政重权的部落诸侯容易挑战王室的权威，所以王室不但需要实权，还需要具备权威号召力和良好的治理能力。周的第十任君主厉王性情贪婪，激起贵族们的政变，周厉王出逃彘国，国事由两位大臣周公和召公主持，史家称这段无“主”时期为“共和”。周厉王死后，他的儿子继位为周宣王，周公召公辅佐他，制订新政策，重振王室的权威。周王朝又重新得到了各诸侯的尊重。

然而好景不长。周宣王之后，继位的周幽王淫乱暴虐。他为博美女褒姒一笑，竟然拿国防大事做游戏（“烽火戏诸侯”），自招大祸。距离周首都镐京仅几十里外，就有犬戎等游牧部落出没，它们早就对周王朝的财富虎视眈眈了，镐京的烽火就是周王为发动诸侯共同抵御游牧部落的进攻而设置的。一系列宫廷事件后，对残暴无德的周幽王心怀不满的大臣勾结了犬戎入侵。犬戎洗劫了镐京，周幽王被杀。虽见镐京烽火连天，但刚被周幽王戏耍过的诸侯们不甘再次被戏，竟无一人前来救援。周王室二百多年的权威地位跨塌了，诸侯国的野心开始膨胀，一个长期混战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了。



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段长达五百多年的分裂混战史，对中国社会进程与文化思想的特殊推动作用，至今仍为人们关注。

周王朝的封国大若城邦，小仅村邑。由于历史记录不全，历史事件过于纷繁复杂，现代人已无法准确地了解封国的总数有多少，只能凭一些有长期影响力的较大封国事迹，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脉络，小封国的历史比较模糊。

镐京被洗劫后，周王朝政府东迁至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称镐金时期为“西周”）。各封国也随之东迁。这时，周的王畿大为萎缩，财力军力损失巨大，再也难以支撑跟随着的封国。随着周王室威德的丧失，各封国逐渐不再尊重周王室至高无上的君权，开始抛弃周室礼教，伺机扩展自己的权力与地盘。

首先发难的是郑国，它大胆地兼并了近邻胡国。胡国国君是郑国国君的女婿，然而亲情挡不住郑国的扩张野心。一系列阴谋诡计后，郑国向胡国发起袭击，很快将胡国灭掉。然而，周王室对这破坏周王朝秩序的大事件却没有任何反应，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历史转折点就从这里开始。各诸侯都明白周王室的权威已是昨日黄花，从此以后，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权位和疆土。

公元前 719 年，卫国发生政变，此后连续数十年混乱。这一年，卫国国君卫完被他的弟弟卫州吁和智囊石厚所杀，卫州吁即国君位。不久卫州吁也被石厚的父亲石蜡借陈国的力量杀掉，他的弟弟卫晋继任国君。公元前 696 年，卫国在位国君卫朔在政变中被赶下台，他的弟弟卫黔牟被大臣们立为国君。公元前 688 年，齐、宋、陈、蔡、鲁五国联军护送卫朔回国复位，卫黔

牟逃亡。

公元前 712 年，鲁国发生政变，在奸滑大臣的挑拨下，国君与其兄弟自相残杀。

公元前 710 年，宋国发生政变。宋国大臣华督煽动兵变，杀死国君，扶持宋国国君流亡在外的堂弟继位。

国君被杀被逐的事件越来越常见，诸侯国之间相互干涉内政乃至侵略攻伐逐渐成为常态。秩序的混乱使诸侯们个个自危，可是能维护秩序的最高权威周王室，却在这些事件发生期间都没有任何反应。危险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为了自保，就算是最没有野心的诸侯，也会被迫选择最大可能地扩张领土，集聚人口，以壮大自身的实力威慑入侵者。

公元前 707 年，周王室的威望再次遭到沉重打击。郑国国君掘突不断武力扩张其领土，使郑国成为春秋早期最强大的诸侯国。凭借实力，他对周王室的不敬开始表面化起来。掘突的儿子寤生更是不可一世，竟然强行收割了王畿内所有的粮食，而且不去都城朝见周王（按周礼，三年不朝见周王，不交朝贡，就要被视为叛逆）。公元前 707 年，愤怒的周王不顾早已衰微的王畿军队，亲自联合蔡、卫、陈等国军队进攻郑国。若是在西周时期，郑国必然早已屈服。然而时代变了。郑国不但集合军队强烈抵抗，而且打败了周王联军，连周王本人也险些受伤被俘。周王朝与郑国交战并且挫败的事件，使原本超然的周王室丧失了仅存的威望，使各诸侯国更形混乱。不过，这次战争也使郑国也失去了强大的力量和霸权地位，政局动荡起来。郑国国君寤生的儿子忽在位时发生了政变，忽的弟弟突在宋国的帮助下武力夺位。忽逃亡卫国。

当周王朝走向衰微，诸侯国日趋战乱时，位于长江流域，一向被周视为“蛮夷”的楚国却逐渐强大起来。楚国一方面接受周王朝先进文化，要求周王朝给予封国地位，主动融入中原文明，一边与周的封国交战掠夺，逼迫它们奉楚为一方霸权。

被兼并的封国越来越多，幸存的封国的地域越来越广大。一些大国逐渐抛弃城邦治理模式，建立起独立的都城进行管理。小封国们开始变少，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吞并，要么依附于强国。它们顺从强国，尚可利用强国的力量使自己以免遭更残酷的蹂躏。于是，强国逐渐代替了周王室“调解与保护者”的地位，小封国开始向这些强国进贡与朝见，诸侯纠纷也由强国主持调解（但强国的最大凭借是武力而非法理），而大国们也开始懂得，在



这个丛林化国际秩序中，自身既然无力影响或统一全部国家，为了确保本国的安全和地位，只有努力拓展安全边界，控制尽可能多的国家。“霸权”秩序时代开启了。

春秋时代依次兴起齐恒公（姜小白）、晋文公（姬重耳）、秦穆公（嬴任好）、楚庄王（芈侣）与吴王阖庐（吴光）五个主要霸权。强大武力、战争胜败、内政修明与否，决定着各霸权能持续的时间，甚至一战而成，一战而失。

公元前686年，齐国大将连称发动兵变，杀国君姜诸儿（齐襄公），立姜无知为国君。后又发生政变，姜无知被杀。逃亡国外的姜小白与姜纠听到消息后都急忙赶回齐国争位。姜纠的智囊管仲暗地里拦截姜小白回国，在半路上射杀他，但未成功。侥幸脱逃的姜小白率先回国登位，称齐恒公，姜纠和管仲只好逃亡鲁国。齐恒公要求鲁国杀掉姜纠，绑回管仲，由于当时齐强而鲁弱，鲁国只好照做。可是当管仲被押回齐国后，事件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齐恒公任命了这个曾差点将他射死的管仲为相。原来齐恒公的首席智囊鲍叔牙是管仲的好友，非常了解管仲的才能，在齐恒公想要任命他为相之时，他却高义让贤，竭力推荐管仲为相。治国人才是时代最需要的。果然，在管仲的帮助下，齐国内修法度，理税制，济贫民，招贤任能；外筑信义，主动地促进诸侯国之间的和平，急弱国之难。于是齐国很快强盛起来，最早建立起霸权。

齐国推行“尊王攘夷”政策。“尊王”即号召各国重新尊重周王朝的正统性与权威性。齐恒公多次以周王旨意的名义召集各诸侯国的和平会议，为各国排难解纷。虽然只是借用了周王朝的名号，让周王的特使坐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但这样做能让齐国拥有无可辩驳的道德正义性，因为毕竟各国仍份属周王朝。强烈的不安全感，使得各诸侯都渴望像西周时期那样的有保障、有尊严，有理可辩的时代重现。齐恒公和管仲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他们尊重各诸侯国的利益，让诸侯们都有了不再自卑，反被尊重的感觉。公元前664年，山戎部落攻打燕国，燕向齐告急，齐恒公亲自引兵救燕，将山戎打跨，然后主动撤军回国。燕庄公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恒公回齐，不知不觉进入齐国境内。齐恒公说：“按照周礼，除了周天子以外，诸侯国君主之间的迎送都是不能出境的，我不能让燕国感到丢脸”，于是将燕庄公所走过的那片土地割让给燕国，只要求燕国重新向周王纳贡。强者以礼相让弱者，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可难得一见。各诸侯国听说后，更信任齐国。

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大国，齐恒公的“尊王”政策和低姿态，使齐国在各诸侯国眼里如同乱世明灯一般，借用现代术语来说，齐国不但具有“硬实力”，更具有其它大国所缺乏的“软实力”，于是各国纷纷归附于他。事实上，齐国并不是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军队也不能百战百胜，曾经两次征伐鲁国都失败了，然而鲁国最终也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所谓“攘夷”，指的是齐国号召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略。齐恒公作为领导者起到了表率作用。除了帮助燕国打跨山戎部落外，公元前660年，狄部落攻破卫国，齐恒公迅速率各诸侯国前往救援，帮助卫国建楚丘城，重立卫君；公元前659年，狄部落攻破邢国，齐恒公也带头帮邢国重新建国。当时的楚王国仍被各诸侯视为南方“蛮夷大国”（楚自称为周王朝的属国，但并不向周纳贡），为遏止楚国势力的北进，齐国率领各诸侯国伐楚。齐楚两军对垒之际，两国代表在召陵会盟。在齐国的重压之下，楚国终于同意向周王朝纳贡，重新尊重周的秩序，答应不再侵略。这就是有名的“召陵之会”。

管仲和齐恒公逝世后，齐国的多个继承人之间发生了严重争斗，齐霸权至此结束了。不过，齐国霸虽衰而国不弱，始终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贯穿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直到公元前221年，最后一个为秦所灭。

齐霸权结束后，接着兴起姬重耳建立的晋国霸权。在一系列残酷政变之后，出逃避祸的晋国公子重耳历尽磨难，终于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夺位成功，称晋文公。也许是在流亡期间深知百姓疾苦的缘故，晋文公即位后尚善待百姓，对在流亡时长期跟随自己的几位忠心耿直的大臣也颇具情义。晋国逐渐强大起来。

公元前636年，周王室发生宫廷事件。周襄王与弟弟姬带发生争斗，引发翟国出兵攻打周首都洛邑，周襄王逃亡。由于原来有力量维护周王朝秩序的霸主齐恒公已死，周襄王便向比较有实力的秦穆公和晋文公告急。晋文公因国内初定，尚犹豫不决，而秦国见这个好时机，即将出兵勤王。经过一番利害权衡后，晋文公决定抢先发兵，帮助周襄王成功复位，这一事件为晋文公赢得了巨大声望。当然，人们从这个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尽管周王室没人敢取代，但它已极为没落，越来越成为强大的诸侯国政客眼里可以被利用的工具。

公元前635年，楚国进攻宋国，宋向晋求救，晋国大臣先轸认为这是建立霸权的良机。由于当年晋文公流亡时，楚国曾有恩于他，曾与楚成王约定



将来“若楚军进攻，晋军退避三舍以报答”的盟誓，不便于主动出击楚军，于是定下先进攻楚国控制下的卫国和曹国，迫使楚国不得不回救，然后破楚的策略。晋军攻下曹国，将曹国国君捉了又放，并暗地里许诺说，若他归顺晋国，将允许他复国，同时在卫国反复制造成变。曹、卫两国果然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有离楚向晋的迹象。楚国果然大怒，向晋军发动进攻。晋军先佯作后退，然后联合宋、秦、齐联军大败楚军。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这场战役，还使得与楚结盟的郑国转向与晋结盟。城濮之战后，晋国霸权确立。

晋文公也曾学齐恒公那样率领各路诸侯朝敬周王朝，获得周王的加封，以正其霸权名位，但他做得并不如齐恒公那么成功，因为这时的各诸侯国都比齐恒公时代更现实了。晋国稳固的六大家族“六卿”（当年曾追随晋文公流亡过的大臣）确保了晋国霸权的长期存在，直到战国时期分裂为魏韩赵三大强国。

秦穆公建立的秦国霸权几乎与晋文公霸权处于同一时期。秦国地处偏僻的西部，自然条件比较差，民智开发落后，本国人才极为缺乏。秦穆公之所以成功称霸，是因为他任用了逃亡至秦的各国人才，比如百里奚、百里孟明父子和蹇叔等，后又任用了百里孟明推荐的三位本国人才，人称“车家三良”的车奄息、车仲行、车絨虎三兄弟，国家逐渐强盛起来。秦国先后灭梁、芮等十多个诸侯国，往西、北方的游牧部落区开拓了广大地域，包括当年曾血洗西周都城镐京的犬戎等部落也为之所灭，霸权确立于周王朝西锤。

身处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常有丛林惯性和对利益的极端短视现象，诸侯们经常忘恩负义，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无法持久。秦晋两国的关系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秦穆公曾多次帮助晋国平息内乱，视晋国为友好邻邦。有一年，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借粮，秦国百里奚认为在邻国有难时出手相救，才是“国之道也”，而另一位大臣子豹认为这是秦国征服晋国的极其有利的时机，秦国应该像许多国家所做的那样抛弃友好关系，趁机攻取晋国。秦穆公最终听从百里奚的意见，送粮救晋。没过几年秦国也遭遇了饥荒。当秦向晋借粮时，晋惠公的大臣庆郑认为当然应该借粮回报秦国，但另一大臣驷射却无耻地说：当年晋国饥荒时，是上天有意将晋国赐给秦国，但穆公这个傻瓜却不要，反而借粮给我国，这难道不是逆天意的行为吗？今天秦国饥荒，是上天将秦国赐给晋国，我们怎能逆天行事呢？最终晋惠公采纳了驷射的意见，不

但不给粮，还发兵攻秦。秦穆公大怒，发兵对晋实施猛烈的打击，将晋惠公擒获。后秦穆公在其夫人（秦穆公夫人为晋惠公的姐姐）的求情下才将晋惠公释放。

晋惠公将太子圉送到秦国当人质，秦穆公对圉非常优待，还将爱女怀嬴嫁给他。然而圉在得知晋惠公重病时，就抛下怀嬴独自回国去争夺王位，成为晋怀公，这件事让秦穆公非常愤怒。晋公子重耳流亡到秦后，秦穆公听说重耳的人品很“贤”，又将爱女怀嬴嫁给重耳。落魄的重耳接受了这个曾经是侄媳的怀嬴，与秦结成“秦晋之好”。秦穆公非常高兴，派兵护送重耳回国，杀晋怀公，立重耳为晋文公，晋文公的霸权实乃秦国所赐。但秦晋的友好是短暂的，晋文公之子晋襄公时代，短视的晋国又主动攻击秦军，秦晋两国终于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多年不断地循环攻杀。

秦国霸权维持的时期较短。百里奚和蹇叔的逝世后，愚昧的秦国国君杀了百里孟明和“车家三良”为秦穆公殉葬。人才空虚后，秦国霸权也终结了。

接着出现楚国霸权。楚国长期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张，许多诸侯国为其所灭，惧其威势的各诸侯国只好跟从它。“召陵之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行动暂且收敛，但它仍然有着广阔的国土和强大的实力，拥有成为霸权的条件。

楚庄王半偃即位后，对内积极治理国政，对外积极开拓地盘，灭了庸国、舒国和戎部落。在攻打郑国时，郑国依仗晋的支持，拒不投降，于是楚军与晋国的救郑援军在郟城展开决战，晋军大败。郟城大战后，楚国确立了一个长期的霸权。

公元前595年，楚国借口宋国杀了他们的使臣，派兵将宋国围困了五个月。宋国百姓大批饿死，已到“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境地。宋国向晋求救，但由于晋国在不久前刚被楚打败，无力救援。最终宋国不得不向楚投降。

晋国虽在郟城之役中战败，但实力犹在。从此，楚晋两大霸权间长期不断地混战着，众多处在两霸夹缝中的小国，命运如狂风中的墙头草一般的无奈。郑国在郟城之役中离晋归楚，公元前575年又被晋国攻打。楚国马上救郑。晋楚两军在鄢陵展开决战，结果楚军大败，郑国便又重新站到晋国阵营里了。城濮之役、郟城之役、鄢陵之役相继发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随着霸权国在战争中胜败相易，各附从国的立场也不得不随之而动。